

2007年卷（总第四辑）

司马迁与

《史记》研究年鉴

主编 庞德谦
副主编 梁建邦 党大恩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07 年卷(总第四辑)

主 编 庞德谦

副主编 梁建邦 党大恩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07年卷/庞德谦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748-2

I. 司… II. 庞… III. ①司马迁(前145~前90)—人物研究②史记—研究—2007—年鉴 IV.
K825.81 K204.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367 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07 年卷(总第四辑)**

主 编 庞德谦
副 主 编 梁建邦 党大恩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渭南澄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6 开 9.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748-2
定 价 25.00 元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7 年卷) 编委会

顾问: 韩兆琦 张大可

主任: 庞德谦

副主任: 梁建邦 党大恩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雅琴 王晓红 韦爱萍 杜振虎 庞德谦 赵怀忠

党大恩 党艺峰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詹歆睿

主编: 庞德谦

副主编: 梁建邦 党大恩

目 录

学术前沿

- 《史记评林》叙例····· 张大可 (1)
- 一项设想和一个建议 ····· 可永雪 (3)

研究综述

- 司马迁研究综述····· (5)
- 生平考释····· (5)
- 思想人格与儒学传统研究····· (6)
- 史学思想:比较、探源及影响研究····· (7)
- 文献学观念研究····· (9)
- 政治观念研究····· (10)
- 人学、美学思想研究····· (11)
- 经济思想及其他研究····· (12)
- 《史记》研究综述····· (13)
- 汉文化研究····· (13)
- 思想内容研究····· (14)
- 体裁体例研究····· (15)
- 人物研究····· (17)
- 版本及校勘研究····· (23)
- 文字考证辨析研究····· (25)
- 考证考古研究····· (25)
- 写作艺术研究····· (27)
- 比较研究····· (31)
- 史记学研究····· (33)
- 《史记》校勘史述论····· (37)
- 汉唐时期的《史记》考订与校勘····· (37)
- 宋、元到近代之前的《史记》校勘与考订····· (38)
- 近代之后的《史记》校勘····· (42)

考古发现与研究

- 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45)
- 《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49)

版本整理与研究

- 版本与校勘研究····· (63)

版本研究	(63)
校勘研究	(65)
语法研究	(66)
校读研究与史实考证	(67)
词语考证	(67)
史实考证	(68)
历史地理研究	(71)

著作与论文摘要

研究著作与论文集	(73)
《史记》部分论文摘要	(77)

台湾及海外研究

台湾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索引(1956—2006)	(90)
台湾出版的有关司马迁与《史记》著作(1938—2003)	(97)
台湾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编录(1961—2004)	(100)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102)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	(102)
日本的《史记》研究	(103)
日本所藏《史记》版本资料介绍	(114)

研究动态

《史记》研究与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简报.....	(126)
“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汉中举行.....	(127)
韩城市世代相传的祭祀司马迁活动	(130)

学术组织与专家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召开第22次年会	(133)
徐兴海教授	(133)

论文论著索引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07)	(135)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07)	(137)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2007)	(141)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目录补遗	(144)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补遗	(144)

史海拾贝

《史记测议》	(145)
--------------	-------

后 记	(146)
-----------	-------

《史记评林》叙例

张大可

《史记》问世 2000 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并传播海外。各种整理《史记》的著作，诸如校勘、注释、考证、版本研究，以及研读评析《史记》的论文论著，层出不穷，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体系，即“史记学”。史记学之名，由宋人王应麟提出。他说：“司马氏《史记》有裴骃、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释。《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王应麟称“史记学”为“《史记》之学”，形成于唐代，这与实际的发展是吻合的。大体说来，汉唐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对《史记》文本的续补和训释。王氏所说的史记之学，列举的各家著述多为注音释义，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唐代的三家注，标志着史记学的形成。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研究成果总量占《史记》问世 2000 年以来的十之八九。宋代以后，注疏只是一个侧面和支流，评点、考证、专题研究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大体说，宋明以评点为主流，清代以考据为主流，近代以思想研究为主流。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成多样的著作，有眉批、评点、札记、书后、志疑、考异、探源、测义、知意、达旨、发微、订补、琐言、辑评、集说、读法、评注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一系统中，明人的摘抄和评点占有突出的地位。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就是一部汇辑评点集大成的论著，可以说就是明代的百家汇评本《史记》，开拓了汇评《史记》的一个新领域，并成为优良传统，后继者不断涌现。有李光缙等人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葛鼎、金蟠的《史记汇评》，邓以赞的《史记辑评》，朱子蕃的《百大家评注史记》，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义》等多种辑评专著。凌氏著作传到日本，日本学者有井范平做了增补，称《补标史记评林》，成为日本学术界的一部经典论著，影响十分深远。

宋人好议论，开一代风气，“三苏”均有《史记》人物论，引人注目。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明代涌现出一批探究和品评《史记》的学者，产生大量的评点论著。评述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是明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撰有《史记评抄》，省称《史记钞》。文坛大师杨慎撰有《史记题评》。其他名流如王鏊、陈沂、何孟春、王韦、茅瓚、董份、王维楨、王慎中、唐顺之、余有丁、柯维骐、张之象、归震川等人都有评抄发微、考要测义之作。正是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中，产生了《史记评林》这样一部集大成之作。《史记评林》作者凌稚隆，字以栋，浙江乌程人。他撰有《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五车韵瑞》，均收入《四库全书》。凌稚隆出身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凌约言撰有《史记评抄》。凌氏父子均钟情于《史记》，子继父业，故《史记评林》是凌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史记评林》的学术成就和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选录历代名家对《史记》的评论；其二，广泛摘取《史记》专门论著和非专门论著中能发明《史记》要旨的精言警句；其三，摘抄《史记》依据的原始资料，探本求源；其四，广泛采录子书、史部的有关论著，与《史记》相互发明；其五，对《史记》文义、段义、字义不时做出诠释，也间或勘误，或纠正三家注之失。粗略统计，凌氏汇

集了由晋至明 150 家评论, 引用书目达 140 余种, 可谓广搜博采, 不遗余力。《史记评林》刊行不久, 与凌氏同代稍后的学者福建晋安李光缙做了增补, 更加充实了其内容。

当代《史记》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步上了一个新台阶, 可以说是史记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 20 余年间, 学术界发表的学术论文 2000 余篇, 出版的学术论著 150 余部, 总成果与《史记》问世 2000 多年来历代的总成绩相当, 撰写论文论著的学者达 1200 余人。提高与普及工作同时并重。《史记》进入了数十所高等院校的学术课堂, 而普及工作进入了电视屏幕。长江文艺出版社以宏大的气魄推出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主讲的《读史记》,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将推出系列的《史记》论著。《百家汇评本史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的。

当代《史记》研究的特点, 是以宏观视角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以往的评点注重微观, 点评局部, 就事论事。今日整理百家汇评, 必须汇辑当代宏观研究的顶尖成果。全面系统解读《史记》文本的专著很多, 《百家汇评本史记》重点选择了三部。其一是张大可教授的《史记新注》, 采录其中的题解与《太史公自序》中的“史记序目”并列为汇评本每篇的头两条, 起提振作用。还有张大可的《史记论赞辑释》、韩兆琦教授的《史记题评》。其他的引用书不一一细述。

《百家汇评本史记》, 是在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基础上, 重新构架, 着重义理阐释。选录凌氏成果约占本书之半, 另一半则是扩大的采录。全书共汇辑 380 位作者, 共 2940 条。汇评条目与本书序论、附录, 以及文本中插入的段意, 统一构成了一个品评解析《史记》的点评体系, 总字数约 50 万字。与凌氏评林对照, 除保留凌氏本原有的五大特点外, 本书的开创有着三个方面的新义, 也就是新增了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首先, 本书评点, 立足于宏观, 全面系统地解读《史记》一书的架构与内容。百家汇评条目是主体内容, 当代作者的评点已立足于宏观。此外, 与之配合的内容为书前有序论, 书中插段意, 书末有附录, 再加上五体评点条目, 以及《太史公自序》中的“史记序目”, 进行有机的组合, 构成了对《史记》一书的架构与内容进行系统的解读, 胜于前人的微观解读, 这是时代的进步, 也是本书时代性的重要标志。第二, 本书对《史记》文本进行了全面的计数整理, 对《史记》中的司马迁原本文字、司马迁引用文字、《史记》的残缺续补文字、读史者增窜文字, 司马迁附记文字, 均做了区分, 并做了计数统计, 运用现代技术的不同字体加以标志。《史记》原文, 宋体; 司马迁引用文字仿体; 补缺文字已考订资料来源者, 视同司马迁引用, 仿体; 司马迁附记文字仿体; 褚少孙续史, 以及读史者增窜文字, 楷体, 读者一目了然。对《史记》原本做如此细致的整理, 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书后附录二, 对这一技术整理做了详细说明与数据统计, 给读者深入考索带来方便。第三, 扩大了凌氏的采摭内容, 主要是凌氏之后的评点资料。此外搜录了 150 余首历代《史记》人物咏史诗, 不乏文学大家的手笔, 如李白、苏东坡等。总之, 新编本《百家汇评本史记》, 是新时代的《史记评林》。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由于篇幅所限, 挂一漏万, 更是难免。权作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面世以飨读者。

此外, 本书着重在供人欣赏阅读, 不承担索查功能, 为省篇幅, 对所采资料, 只括注书名, 至于卷数、版本等内容删略。对凌氏《史记评林》的采用, 一律括注“《史记评林》引”, 示不掠人之美。凡凌稚隆本人按语, 只括注“《史记评林》”, 引字自然删略。李光缙的增补, 亦统称“《史记评林》引”, 特此说明。

是为叙例。

2007 年 6 月作者于北京

(梁建邦编)

一项设想和一个建议

可永雪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开设《研究前沿》专栏，约嘱撰写“史记研究方法讨论”的文章，我贡献不出什么好的研究方法，倒想出一个主意觉得不妨一试：发扬发扬学术民主，开展一个让大家共同开列研究选题的活动。

就每个参与的人而言，所开列的选题可分两个部分：一、当下您正在进行中的（实际已着手做的）选题；二、今后您准备做或认为应该做的选题。汇集第一项选题，便大体可见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研究现状；汇集第二项选题，便可看出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前景。

这一活动的意义在于：将这些选题会聚起来，乃是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界集体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一种结晶，一种展示，它将起到彼此沟通，相互启迪，激荡学术火花，点燃前进火种的作用。

因为，我们有本学术领域的一批领军人物，他们一向站在学术前沿，不断以自己的实绩，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他们所开列出的选题（无论是正在进行中的还是准备做、认为应该做的），都会有引领前沿的示范意义和指向价值。

我们有一批以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作为毕生职志的学人，他们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了大半生，他们可谓识途老马，不管是信马由缰式的漫游，还是嘶风驰骋，意欲发起某种冲刺，他们所开列的选题，岂止仅有观摩、参考意义！

我们还有大批具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的中年骨干和青年新秀，他们意气风发，锐不可当，许多包含闪光亮点的新观念、新思路、新领域和新的学术生长点，正在他们头脑里孕育、涌生，他们开列出的选题，定会让人耳目一新，从中获得无限生机与活力。

还有广大爱好者、新手。他们虽然刚刚开始接触和踏进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之门，但他们凭着未染先入之见的那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黑纸和初试牛刀的陌生感，反而有可能以新的视角、新的视点和新的思维方式，发现并提出许多新问题。

总之，我们有理由期望，把这么多智慧的火花集中起来，展示出来，那景象一定是烂漫而璀璨的！对于参与的每一个人来说，一定有他可以采撷，可以吸取，或可以触发出什么的东西——说不定是极可宝贵的东西；而对于我们的学会，我们的集体，则可从中酝酿大题目，架构大设想，从而发起某种大工程。

设想都是美好、诱人的。但要落实、做好，收到预期成效，还必须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予以保证：

一、为要选题真正开列好，首先一条必须保证它的真——参与者要真心、真诚，开列出的题目是真货色。为此，一定要有学术乃社会公器的认识和气量，打消怕泄密、怕好题目被别人抢了去的顾虑（当然，倘若觉得某个题目属于个人神来之笔的学术“灵感”，非保密不可，那也不必勉强）；二要有大胆地、坦荡地展示个人见解的勇气，打消题目不够分量、不够成熟，怕公布出去贻笑大方或说出去完不成不好意思的顾虑。

二、要落实活动展开的具体方式和办法。我想可以用：1. 由两会（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司马迁研究会）印发表格请会员填写的方法，或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栏发出调查或征求意见表请大家填写；2. 在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主办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和中国史记研究会主办的《史记论丛》或年会简报、陕西司马迁学会主办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或年会简报上辟专页，刊登或选登会员以及读者所填的选题；3. 在刊登和公布会员与读者填报的选题之后，选择适当时间与机会，就已发选题展开讨论。可以在研究会的年鉴上以会议形式进行，也可在刊物或简报上以笔会的方式陆续进行讨论，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更好。

三、要尽可能动员更多的人广泛参与，至少中国史记研究会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会员有义务参与。

（梁建邦编）

约稿启事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离不开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学术组织、海内外广大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学者及司马迁和《史记》爱好者的深切关心和大力支持。

值此《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7年卷）出版之际，我们继续向社会各界征集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资料和稿件。

凡是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信息、学术会议概况、论文、论著、编著发表出版情况、《史记》出版和翻译情况、学术组织情况、《史记》考古发现、版本整理和研究、研究专家介绍、文物图片等都在征集之列。特别欢迎专家学者为“学术前沿”“台湾与海外研究”“史海拾贝”栏目赐稿，并能及时将自己发表的研究成果原件赠寄给我们。

我们的通讯联系方式是：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朝阳大街中段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

邮政编码：714000

电子信箱：wnsysjyj@163.com

联系电话：0913—2133028

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编辑部

2008年8月18日

研究综述

司马迁研究综述

不完全统计,2007年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研究的论文有30多篇,研究著作数部。从近几年司马迁研究的基本态势看,2007年的总体研究状况是,许多中青年学者在各自的工作中拓展了司马迁研究的论域,而且对司马迁研究的兴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试图描述司马迁精神和人格中平凡的一面;在对司马迁思想观念的理解中,“批判”成为一个高频词,这暗示出研究者的理解思路可能会有某种整体性的转型。下面,我们从七个方面对2007年的司马迁研究情况,作以简单叙述。

生平考释

由于资料的限制,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考证一直就局限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而最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可期望,因此,除过以往几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和少数长期关注这一工作的文献学者以外,司马迁生平考证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往往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2007年出现的相关论文呈现出了新气象。

吴朋飞和张慧茹《司马迁所居“夏阳”城址考辨》(求索/2007/10),从历史地理学视野出发,考证司马迁所居夏阳古城的具体位置。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少梁(夏阳)的建制沿革、文献记载的少梁城城址位置和考古勘察所得少梁城城址的问题。作者梳理了古代文献关于少梁古城的记载,指出西汉中叶之前,少梁(即夏阳)古城没有迁徙的可能,其位置在今韩城市南23里处。同时,作者概括了在韩城所进行的古城城址考古勘察的相关成果,指出考古学者关于少梁古城城址的推断存在的失误。最后,论文指出少梁古城在今韩城西南11公里高门原东角,东起瓦头新村,经堡安村南,至吕庄北,城址东西1.75公里,南北1.5公里,古城依原而建,位于濂水、芝水交汇处之西的原头上,东距黄河夏阳渡3公里,南距魏长城不过4公里。吴朋飞和张慧茹的这一工作虽然局限于对少梁古城位置的考证,但正如他们所说,对司马迁研究工作的某些方面会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应该是能够给研究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司马迁早年的生存环境以及由这一生存环境,给司马迁世界观的形成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某种必要的前提。

陈曦《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06),不单纯是关于司马迁卒年的考证,甚至可以说无意于司马迁卒年的考证,作者的立足点正如文章标题所显示的,是关于“司马迁卒年问题”的学术史回顾。论文指出,对司马迁卒年的考证往往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联系在一起,与《报任安书》的写作联系在一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开始于清代学者赵翼,经过郭沫若的推动,而当代学者对此响应最热烈、用力最勤的是袁传璋。作者在这番学术史回顾中所发现的最大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遮蔽了研究者的眼光,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汉书》的记载。作者指出以往研究工作的的问题之后,并没有展开的新的考证,而是维护一种更平常的结论:即司马迁卒年绝不可考。但是论文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从复原巫蛊之祸这一历史事件的现场感出发提出的问题:司马迁在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权力斗争或者巫蛊之祸中持有何种政治立场?在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陈曦通过对《史记》的相关叙述和《报任安书》的分析指出,司马迁无论在人格气度还是政治观念上都与戾太子及其周围的文人集团保持距离,但是巫蛊之祸所造成的特殊时代氛围深化了司马迁对汉代政治的理解,也坚定了司马迁远离政治斗争以发

愤著书的信念。论文的论证过程和最后结论都显得非常节制,但是这一研究在可以扩展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生活当中,司马迁可能选择的位置以及这种选择对汉代知识者群体的影响如何?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陈曦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我们进一步理解司马迁内在精神世界的新的可能性。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读书/2007/03),提出的问题是司马谈为什么会在公元前110年因为不能亲自参与泰山封禅大典以至于发愤而卒?从古代巡守即封禅仪式理解出发,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历法,夏历是阴阳合历,这种历法需要细致观察日月运行,其结果最终必须落实到某种具体可感的地面标志上,而山脉就成为这种地面标志的理想选择。封禅正是从一种观象授时的科学活动逐步演变为祭天告成的宗教仪式,这种转变赖以完成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与古人的政治观念有关。在古人看来,“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帝王的世俗权力是由天意授予和证明的,而政权、通天权,或曰神权的授受,无非就是天文历数的授受,天文历数是与天沟通从而领会天道神意的唯一途径。文章仔细考察了泰山封禅与观象授时活动之间的历史渊源之后,转入对司马氏家族历史的叙述,指出司马氏家族自古就是负责观象授时的天官,而太史一职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仰观俯察、敬授民时。文章最后指出,司马谈正是从自己不能参与泰山封禅大典这一偶然事件中预感到家族传统的没落才发愤而死。作者更进一步从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生活转换中指出司马氏家族传统没落的历史必然性:仰观俯察的天官曾经是通天的使者、神明的代言人和天机的洞察者,同时,太史掌邦国之典籍,他还是知识、历史和谱系的秘传者,但随着专制制度的巩固,天子奉天承运,成为天命的唯一象征,太史一职早已沦落为主上所戏弄的文史星历之官,与卜祝、倡优为伍了,他的神圣意义被剥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太史公和司马氏的位置了,而司马谈之后,司马迁的悲剧命运也必须在这一历史趋势中理解。刘宗迪的文章虽然重心在司马谈,但由此观与司马迁的悲剧命运给出的解释是非常有力的。

2007年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考证从整体上虽然数量是少了些,但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原因在于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近的立场,不再作纯粹的史料考辨,而是对有限的资料做深度阐释。当然,这种深度阐释因为研究者开阔的知识视野和对历史现场的追踪而避免可能存在的阐释过度。

思想人格与儒学传统研究

2007年度关于司马迁思想人格的研究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就是如何理解司马迁思想人格与儒学传统的关系。

陈纪然、孙树勇《〈史记〉礼治思想探析》(学术交流/2007/11),从社会功能、情感意义和历史沿革三个方面描述司马迁的礼治思想。论文指出,在司马迁那里,礼具有规范人道、促进人性人情和谐的功能,同时只有与时推移,礼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周永刚、向德富《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扬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7/04),首先回顾了先秦仁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指出孔子奠定了先秦仁学关心人、尊重人的基本主题,孟子从两个方面扩展了仁学思想,形成了内圣外王的仁学思想体系。其次,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对先秦仁学观念的继承和改造:1. 司马迁强调仁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2. 司马迁以先秦仁学观念为基础,推进了仁学思想的深化,特别强调其道德自律精神和作为道德价值标准的积极意义;3. 司马迁以仁学观念作为衡量政治事件的价值基础;4. 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放弃道德意义上的尊卑等级观念,重视人的欲望和富裕的要求,重视道德的历史性或道德权变。

孙明霞《司马迁与孔子——同是天涯沦落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成都大学学报/2007/05)指出,儒学思想作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在司马迁身上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及儒

学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1. 司马迁的早期教育以儒学思想为主；2. 司马迁与孔子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悲剧性格；3. 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论给司马迁提供了论史鉴人的标准；4. 司马迁与孔子的人生智慧和生命体验有一种共鸣；5. 孔子慎重、严谨和征信的治学态度为司马迁所吸收。

这一组论题相对集中的文章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可能对以往研究有所推进，但整体上的研究意识则是，从当代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从古典文化挖掘思想资源。然而让我们略感遗憾的是深度并没有能超越此前的工作。

史学思想：比较、探源及影响研究

史学思想研究是2007年司马迁研究最具有价值的领域，既有该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新成果，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经过相当时间沉淀而奉献出的论文，而更重要的是对新方法的娴熟运用、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及理解问题的知识视野都呈现出某种需要关注的新气象。

张大可《司马迁怎样写〈史记〉》（红河学院学报/2007/06）思考的重心是司马迁的历史学方法论，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 原始察终。论文把《史记》叙事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即积德累善的古朴时代、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暴力征伐的战国时代、急剧嬗递的秦汉之际和大一统的当代。在对每一个时代的简单描述中，论文强调，司马迁原始察终的内涵就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2. 见盛观衰。见盛观衰就是通变，就是以变作为历史发展的主题，论文从时势变化、天下兴亡和个人的穷达转换等论证司马迁重视变化的辩证法思想。3. 详变略渐。详变略渐既是见盛观衰的具体显示，又与详今略古相配合，显示出司马迁能够把以古为镜与古今不同结合在一起的思想特色，论文通过统计殷周之际、战国、秦汉之际和汉武帝建元到元封这四个时期的叙述篇幅，指出古代史上变化最快的四个时代虽然时间不足300年，但其叙述超过《史记》80%的篇幅。4. 熔铸改写。熔铸改写是司马迁体现其史学思想的具体写作方式，也就是和协六经异传、统一百家杂语的方式，论文归纳出剪裁摘要、增补文史、训释古文和熔铸改写等四种不同具体形式。

王成军《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史学理论研究/2007/02），采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着力挖掘司马迁史学观念的现代意义。论文首先明确建立起自己的概念系统：世界历史或者全球史、“普世史”和《史记》的史学观。论文指出，古希腊文化对理性的重视和探索产生了希腊的哲学，而且希腊理性始终把不变性、确定性、无矛盾性的本体研究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其必然结果就是希腊罗马的史学长期必须依附于其哲学而无法独立存在。古希腊罗马的原始史学以历史学家的“目力所及”或者个人感知作为历史叙事的基础，直到希腊罗马化时期，普世史作为新的范式替代了原始史学。但是这一新的范式有突出弱点：实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导致了将希腊史、罗马史和“世界史”等同起来，将世界民族的历史多样性统一于希腊罗马的历史品格之中，同时导致了思想观念先行于历史并决定历史，还形成了因果判断而忽视道德价值判断的自然主义和强调价值判断而忽略因果判断的伦理主义的不可协调的价值二元论格局。论文紧接着转入对司马迁史学观的描述，论文指出，“正《易传》”是司马迁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而所谓“正《易传》”就是“变易”的哲学世界观，《易传》把这一世界观概括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基本内涵就是“时变”的天文观（自然观）和“化成”的人文观（历史观）的统一。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通变”观念。这一观念首先表现在司马迁重视的历史实践的共时性，把纵向的历时性发展与横向的共时性变化融会贯通，从而建立复杂的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性。其次是司马迁冲破了古老而狭隘的种族意识，着力使历史实践中的人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人，司马迁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人文思想的基础上，使“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理想不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具体地统一在历史实践中。最后，司马迁以“继《春秋》”开始，高度评

价了《春秋》伦理主义史学真正的道德评判作用,更进一步把道德判断置于同因果判断的矛盾中并建立起因果判断和道德判断相统一的价值观。最后比较了希腊的普世史和司马迁的史学观念,论文指出,从真正的“世界历史”观念出发,它所需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面面俱到,而是在结构上成为有机的整体,以反映世界各个地区的内在联系,《史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同时,司马迁的通史观与普世史学比较,更显示出对人类历史长时段的宏大关怀;第三,司马迁的史学观与普世史观念相比具有超出垂训史学的宽阔文化胸怀;最后,司马迁所探求的历史本质是基于历史过程本身,而不是希腊罗马的基于世界本原的理性,司马迁所把握的历史本质是在历史过程中,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而不像希腊罗马的理性那样是永恒不变的,是预先设定于历史中,并预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因此,司马迁较之于普世史更多地表现在其史学意识已经深入到世界历史的思想深层次,他的史学观对于更好地理解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世界史的体系和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王成军的另一篇文章《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史学史研究》/2007/04),依然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探索中西传记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趋向。从中西原始崇拜与其文化结构入手,论文指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但是,古希腊经历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各自相对较充分的发展后,祖先崇拜的许多内容和作用却被英雄崇拜所取代,自然崇拜和英雄崇拜成为古希腊主要的文化表现形式。直到罗马时期,由于罗马祖先崇拜的盛行才在宗教意识上有了某种逆转。而尽管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也是华夏文化最初形成的两种主要形式,但是其总的发展趋向却是两相融合的,并且祖先崇拜占据主导地位。祖先崇拜制约着人的时间意识以及生命价值观念,构成传记史学起源的基本文化依据。中国从祖先崇拜出发,总是以那些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地位显赫、形象高大的祖先为时间界碑,并由此形成历史记忆的网络。在这个特殊的文化氛围中,祖先崇拜通过祭祀和丧葬仪式而制度化,传记史学也因此经历了三个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殷周革命、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这三个阶段隐含着某种共同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意识觉醒和不断深化,而传记史学就是顺应这一时势的产物。而古希腊传记思想观念虽然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但直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才真正宣告诞生。中西古代传记史学诞生之后的发展趋向也明显不同,古希腊古罗马的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自成一家,同叙事史学分庭抗礼,并行不悖,而且在传记史学体裁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分化,一方面,越来越趋向于文学传记,而同历史渐行渐远,只有帝王传的价值还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而中国的传记史学虽然也经过了叙事史学阶段,但并没有将叙事史学加以抛弃,而是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于一尊,形成了中国的正统史学,并长期称霸史坛。

张桂萍《〈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上海大学学报》/2007/05),主要考察的是司马迁所创立的史表体式对清代人的影响,论文分为两个部分:清代人对《史记》史表作用的阐发,清人对史表编纂及其应用理论的总结。论文指出,在《史记》的接受过程中,清代以前的人对于《史记》史表或者从文章学的角度称赞其论赞,或者取其史料价值以辩证史实,很少能意识到史表在整个历史编纂体系中的作用。从清初开始,许多学者开始阐发《史记》史表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清代学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史表与纪、传合观,可以直观天下兴衰的大趋势;史表配合纪、传,补缺省文,可以探究史家于史料取舍中隐含的价值观;断代史表可以彰明一代之历史进程。清代学者不仅阐发《史记》史表的作用,而且由此形成了关于史表编纂的基本理论,论文也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内容:清人首先关注的是如何运用史表,提出救其弊、善其用的原则,而随着这一运用原则的确立,史表在清代人那里往往成为一种独立的史学编纂体式;清人关于史表编纂的基本原则所谓类例之法,也就是所谓的类型学方法,但在类例之法的应用中必须顾及史表与其他体式之间的配合,因此必须从价值观出发,形成严格的从略和特书的规范;最后,清人要求史表的编纂应该是史法和时宜的结合,要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许勇强《〈史记〉叙事“抵牾”简析》(《求索》/2007/05),从《史记》叙事抵牾这个具体现象出发,

提出了一个有意义而只得继续探索的问题。论文指出,《史记》叙事抵牾有四种情况: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有微意存焉;整齐百家杂语的后遗症;误书。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有四个:个人才力的局限;时代忌讳;史料不足;史学方法论的局限。在作出以上分析之后,论文紧接着指出,除过误书以外的其他三种情况与《史记》的实录精神都不矛盾。论文在这里显示出自己所隐含的问题:在《史记》的接受过程中,长期以来有一种对《史记》叙事真实性抱有怀疑态度的倾向,如何理解这种倾向涉及某些历史学和历史诗学的根本问题。许勇强的论文再一次提出了问题,而且隐含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文献学观念研究

司马迁撰写《史记》过程中的文献整理工作及其所隐含的观念成为近几年研究工作的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域。2007年依然保持着这一态势,而且其中易宁的论文明显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准。

易宁《论司马迁的文献批判思想》(安徽史学/2007/06)着眼于司马迁撰史过程中所显示出的文献学方法的梳理,论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对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的剖析。论文指出,司马迁撰史所涉及的史料包括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在所难免,因此司马迁必须对纷乱复杂的材料是否具有可信性作出考辨,“考信于六艺”正是他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确立这一原则依据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六艺”作者与其所载史实大体处于同时代或相去不远的时代,史实更具有真实性;二是司马迁认为“六艺”经过孔子的编定或整理,是基本可信的。在辨别史料可信性的原则确立之后,司马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充实了其内涵:首先司马迁以“六艺”为准绳,在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取舍中坚持合于经文者选而录之,不合者则删削之。其次司马迁以“六艺”作为考信史料的标准,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六艺”载史多有缺佚,而且有语焉不详处,因此他采用了经文互证的方法。这一方法不仅用在字义的解释上,而且也运用在史实的解释上,反映了深刻的文献批判思想。正是在对“考信于六艺”的史料辨别原则的具体运用中,司马迁达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成一家之言就是既要“拾遗补艺”补“六艺”之缺,对“六艺”的理解自成一家之言,又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稽合六经异传之同异,整齐百家杂语,折中取舍。论文就此指出,司马迁在对经传异说的取舍上,不拘泥于经师的家法师法,不株守一经一说,而是广泛采用今古文说,表现出中国古典史学独立于经学时所具有的博大涵容和吐故纳新的气度和“无征不信”的治史思想;司马迁同时十分重视采用百家杂语,但是他始终让这些采纳入史的杂语在思想上与经文保持一致,用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推理采纳百家杂语以补“六艺”之缺。论文最后指出,司马迁出于他自己撰史的需要,他以儒家六经合百家杂语作者思考的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揭示其没有表达出的思想,实现了当代人的思考和古典思想的真正互动。他把经文异传、百家杂语和史实融为一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表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了鲜明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和自我授权的历史批判思维,而这一历史批判思维,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形成了中国古典史学独立于经学时所表现出的最重要特点。

江林昌《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烟台大学学报/2007/01),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探索司马迁和《史记》的文献学价值。论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的可信性分析,论文指出,司马迁撰写“五帝”“三代”本纪其史料可信性有三个根源:家学和师承决定了司马迁能够超越经师的狭隘,这提供了“五帝”“三代”本纪史料可信性的学识基础;熔铸先秦典籍,引书达一百多种,这提供了“五帝”“三代”本纪史料可信性的资料基础;广泛游历、实地考察,这给“五帝”“三代”本纪史料可信性奠定了实践基础。二是分析“五帝”“三代”本纪史料的局限性,论文指出,由于秦朝的焚书坑儒造成上古史料的残缺,同时司马迁出于“考信于六艺”的主观动机,这都影响了“五帝”“三代”本纪选择史料的视野。

肖文建、钟国文和王述球《论司马迁〈史记〉中的档案思想》(档案学研究/2007/01),从四个方面归纳了司马迁的档案思想:1.以史官记注为核心的档案记载思想;2.以专职保管——有王室宗庙、国家档案馆、官府和官员私人保管等多种形式——为主,以业余保管为辅的保管思想;3.兼有找历史根据、做凭证依据和撰写史书等因素的档案综合利用的思想;4.司马迁形成了有价值的档案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考察、广征博引,搜集整理筛选加工、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不溢美不隐恶,利用档案进行创新工作。

王云庆、张翠平和刘衍通《存亡继绝,开拓创新——论司马迁著〈史记〉对档案文献保存之贡献》(档案学研究/2007/04),从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对档案学的贡献:一是司马迁在先秦文献保存的基础上对上古史料做了有价值的整理和辨伪工作;二是司马迁的档案编纂思想,这主要包括述而不作、秉笔直书和厚今薄古以关注时政和大历史观等;三是档案加工思想,这主要有直接征引、闻见异词而两存其说等。

政治观念研究

司马迁政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是整个研究工作中相对薄弱的领域。2007年出现的几篇论文虽然明显不在同一个起点上,但是同样显示出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扩展,于逢春的政治地理学思维方式、黄敏潜在的政治哲学视野和吴国富的影响史观念都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创新意识。

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02),以《史记》五帝、夏、商、周、秦“本纪”,楚、吴、越“世家”,匈奴等“列传”为中心探索司马迁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建构“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在此基础上,研讨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等问题。论文分为引言、《史记》有关“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纵向与横向构筑、司马迁构建“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的历史条件、司马迁构建“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的理论与地理学准备和结语五个部分。论文首先描述了司马迁构建“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论文指出春秋时期以降,处于中原边缘的秦、楚、吴、越等族群,逐渐被纳入到中原的华夏族群之中,华夏族群的界限随之外展,华夷形态也相应变化。嗣后,秦始皇借横扫六合之余威,四方征伐,将华夏族群界限再度扩展。到了西汉前中期,由于汉武帝的开疆拓土,西汉的疆域达到了中原农耕族群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也达到了华夏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使得滥觞于秦始皇的“泛中原板块”于兹最终奠定。伴随着华夏族群界限的大规模移动,一些夷狄族群被包容了进来;另一些夷狄族群则组成国家或部落联盟,要么与汉朝处于敌对状态,要么与汉朝形成隶属关系,抑或游离于汉朝势力圈之外。与“泛中原板块”地理的统合过程相同调,晚周秦汉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理念。在华夷族群的互动之中,夷狄与华夏族群均产生了异族(族群)意识,自然产生了自我认同与他者意象。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既要回应华夏族群自身的认同问题,又要慎重看待与华夏族群或犬牙相错或密不可分的夷狄族群问题。凡此总总,又催生了古代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的登场。司马迁恰恰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从而完成了历史赋予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其次,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还原《史记》有关“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观念构造。论文从对华夏民族族源的辨析出发,强调对于华夏这样巨大的族群,无疑有着多歧的族群来源与迥异的骨肉血脉,但是司马迁基于自己的当代意识、特别是民族认同的现实需要重构民族记忆,通过证明五帝之间,以及五帝与夏商周秦之间具有共同的历史根性,进而赋予庞大的华夏群体以“共同血缘”意识,从而建立起《史记》以“本纪”为纲,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一以贯之,凸显并预设了其以帝王为中心的族群谱系框架,同时,为了连缀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3000多年的历史时间,在“十二本纪”之后安排了“十表”,用于对时间的梳理,以及由表以得人与事,而后与时代会通,把握历史之关联性。论文

由此还原出司马迁“华夷同源”、“天下一统”观念的纵向构造。从横向角度看,论文以楚、吴、越“世家”和匈奴等蛮夷列传为素材指出,虽然秦、楚、吴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和西南夷与中原华夏族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司马迁依然通过阐释和重构的方式赋予他们以共同血缘,从而建立了空间意义上的广泛而庞大的血缘共同体神话,显示出王者独尊的大一统思想,即为西汉中叶之前华夏族群边界向外拓展提供了根据,也明显影响了魏晋以下夷狄族群边界向内漂移的历史进程。再次,论文描述了司马迁构建“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的历史条件。论文以华夏族群边缘的拓展为线索分两个时期分析民族观念和具体的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晚周春秋初期,由于周边族群不断内迁,引发了中原华夏族群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春秋霸业,另一方面,也形成包含一系列文化差异——高贵与卑贱、典雅与猥琐、仁义与贪婪等——夷夏之辨的观念。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文化交流的频仍,夷夏之辨的观念逐步淡化,造成了华夷同居天下、共处海内的新局面。这些给司马迁“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第四,论文揭示了司马迁构建“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的理论与地理学条件。在这里,论文把秦汉国家作为必要的地理条件,侧重于论述作为司马迁思考问题的理论准备,从思想的传承和影响去看,孟子“定于一”、公羊学“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和董仲舒以文化为核心的夷夏交变等观念都给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最后,论文指出,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由于人口迁徙、族际通婚、宗教文化的变易、区域性语言的融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地理和政治空间意义上的夷夏边界不断变动,迄于西汉中叶,帝国内部充斥着夷狄族群,帝国边界环绕着夷狄族群,如何对待这一状况是一个紧迫而巨大的问题。司马迁生活在这个时代,他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族群认同必须根源于族群心里中最重要的共同血缘的感觉。因此,他采用纵横叠加的方式建立起以黄帝神话为核心的华夷同源的叙事形式,为天下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黄敏《伍子胥、勾践、夫差复仇比较——〈史记〉中的复仇意识管窥》(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7/04)分三个部分,论文首先区别伍子胥、勾践、夫差三人不同的复仇者身份和复仇道路,其中伍子胥是个人英雄复仇、勾践是亡国之君复仇、夫差是强国君主复仇;其次分析了伍子胥、勾践、夫差不同的复仇心理,其中伍子胥是司马迁所说怨毒之人,勾践复仇隐含了政治功利和个人道德的某种紧张,夫差则又不忍人之心;最后指出司马迁的复仇意识的核心是扶助弱者,这种复仇意识具有潜在的政治价值。

吴国富《〈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南昌大学学报/2007/03),主要讨论司马迁的《史记》叙事及政治观念对陶渊明的影响。论文首先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分析指出《史记》是他经常阅读的典籍,而身处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正是从司马迁那里获得了建构自己政治理想的历史原型;其次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出西汉时代对暴秦政治的反省以及由此产生的崇德观念,在陶渊明的时代,暴秦政治已经抽象化为一个象征符号,陶渊明借助这一符号表达出自己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最后,司马迁所描述的汉文帝时期“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的情景构成陶渊明桃花源叙事的历史依据。

人学、美学思想研究

对司马迁人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整个研究领域最具有现代意味的,它可以转化出某些能够推进整个人文科学发展的命题。2007年的论文中,杨永康的工作是最能体现该领域的特殊意味的,如果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也许会产生许多全新的结论,推动对作为当前学术热点之一的中国文论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理解。

王金辉《〈史记〉所弘扬的人文精神浅析》(现代语文/2007/06),用一种简明的方式归纳出司马迁所张扬的人文精神的内容: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经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进取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人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